

十九大党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会通

陆卫明，张敏娜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十九大党章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其基本要义从三个方面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会通：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贯穿于党章基本精神的始终；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华传统文化背景共同支撑着党章关于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主旨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融合渗透于党章关于“党要管党”、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选人用人标准等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和要求。

关键词：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杜林论》

中图分类号：D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8)01-0045-07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8.01.008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必然和五千多年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融汇基础。《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杜林论》和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源流为背景，聚焦十九大党章要义，阐析体现于党章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会通之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视角，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

一、贯穿于党章基本精神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共产党章程》自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如十九大党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

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作了全面系统阐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质因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准备了全部的思想条件。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照应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似的三两句话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2]45}。在中国，形成于商周的天命神予、畏天尊神等宗教思想在春秋时期已发生动摇，出现重人轻神甚至无

收稿日期：2018-01-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机理研究”(2016A001)

作者简介：陆卫明(1964—)，男，浙江象山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研究，E-mail：wmlu@xjtu.edu.cn；张敏娜(1978—)，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伦理、传统文化研究。

神论的倾向；《道德经》否定了神识的存在，以“道”的全新概念统领天地万物发展规律。先秦大儒荀子建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的唯物主义观点。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唯物思想，首注《道德经》，对“道”做了唯物主义改造与阐释。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庄与唯物主义倾向明显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申不害列入同传，认为韩、庄、申“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两汉之际谶纬迷信盛行，桓谭以“烛火喻形神”，提出唯物主义的形神关系论。东汉反神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推崇自然天道观，否定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3]122}，其唯物论是对“道法自然”的吸取，其“元气自然论”亦继承了老子的“自然”思想。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者范缜著《神灭论》，向作为南梁国教的佛教“神不灭”思想发起论战，引起朝野轰动，成为无神论思想史上的丰碑。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吸取了黑格尔哲学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最高的思维形式”^{[2]18}。事实上，黑格尔本人深受老子辩证思想影响，尽管他对中国哲学存有偏见，但仍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推崇老子为古东方世界精神代表。在世界范围内，或在以哲学思辨著称的德国，若要公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必是老子无疑。然而辩证法思想的流传，并不拘于道家一脉。墨子将历史经验、百姓体验和实际效用作为检验真理的三条标准，是认识史上的创举，也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远古呼应。魏晋玄学家王弼将“本”的特征抽象为“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认为经验知识范围内的确定对象，不具有“本体”的绝对无限性^{[4]289}，这其实是对本质和现象区别的客观描述。北宋王安石在《洪范传》中以“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指出事物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更在《老子注》中认识到对立双方的依存关系，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动力归结为普遍存在的矛盾与对立^{[5]308-309}。王安石这一认识不仅精深解读了老子辩证思想，也在义理上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表述。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

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编的“理论”部分总结道：“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06-307}。在中国，从西周时期“天惟时求民主”的重民、保民思想，到《尚书》所载的“民惟邦本，固本邦宁”^[6]，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252}，以“民本思想”表述“群众观念”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身建设的基本要求，除了始终坚持“情系于民、利谋于民、权用于民”“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事关党生死存亡”的群众立场，还在党的十八大党章增补了“以保障民生为重点”“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重民、惠民要求，更在十九大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作为高频词在党章中出现了百数次之多。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念和中华传统文化民本思想最崇高的敬奉、最艰苦的求索和最卓绝的实践。

（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通

科学社会主义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来源，揭示了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关于现实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傅立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是和它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2]281-282}。最能为恩格斯这些评价作注解的，就是傅立叶本人的经典名言：“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指望发生大火烧掉四分之一个城市，玻璃安装工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2]282}。傅立叶的犀利，跨越时空，在先秦法家思想中碰撞出回响。《韩非子·备内》这样分析利益驱动机制对人的功利影响：“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5]83}。

关于理想社会，《反杜林论》中描述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新拉纳克大型纺织厂建立共

产主义移民区,以商业方式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安排并成功实现了社会成员福利、尊严和道德显著提升的事实^{[2]283}。同样,我国早期道教经典《太平清领书》就设计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权利均等互助互爱的“太平”社会,成为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起义军首领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权实行倡诚信、废酷刑、抑物价、设义米义舍等宽惠于民的政策,深受群众拥护,成为底层人民向往的乐土,被《后汉书》和《三国志》分别赞以“民夷便乐”“民夷信向”“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5]205-208},不啻为理想社会的生动实践。

《共产党宣言》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根本使命,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盛赞了被杜林“以轻蔑态度鄙视的”欧文:“欧文不仅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五年(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2]287}《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十九大党章再次明确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做出了精确描述,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先秦儒学就有类似的构想与表达:春秋公羊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次进化的;《礼记·礼运》分别基于利益分配、礼仪和道德,设想出小康、大同两种秩序社会^[8]。近代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将《春秋》公羊三世中的升平世、太平世分别与《礼记·礼运》中的小康世、大同世相对应,于1884至1885年间先后撰《礼运注》《人类公理》,描绘了一个无国界、无私产,“公农”“公工”“公商”,共同劳动、共享财富,无权贵、无压迫的“大同之世”:工人在大同世界的数量最多、地位最高、待遇最厚^{[5]514-516}。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距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晚了三十六七年;距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纲领》形成,早了三十六七年。历史的巧合大概隐喻着这

样的事实:人类最高智慧和理想,都会经由各自路径在同一山顶汇合,而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和文明,从来都在薪火传承的前赴后继中走向未来。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暗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一定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及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反杜林论》第二编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2]159}。司马迁在《史记》里阐述了丰富的经济学思想^[9],并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政治成败、社会治乱、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的根源^{[5]130},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联系,与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方面揭示社会矛盾,进而为消除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提供指导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余英时曾撰文研究儒家“勤”“俭”等经济思想,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一种自发或自由经济秩序理论。当然,党章中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经济学说的精髓,更多还是体现在对当前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的具体指导下。

二、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依据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

党的十九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要求,在党章中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容,提出了对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要求。某种意义上说,十九大党章新的一揽子安排正是我国历代先贤大儒经世情怀和治国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新时代付诸实践的新维度和新坐标。

(一)十九大党章提出的“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10]72-73},既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具体实践,亦是为生民立命的现实写照

《反杜林论》认为,“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

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2]157}。先秦时期,管仲、子产、韩非子都视国强兵壮民富为理想。管仲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物质精神关系上,与后世司马迁、王充所见略同。汉末学者王符认为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下贫而上安,视“富民”为救乱扶危的良药^{[5]156-157}。十三大以来历次《党章》修正始终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正是十九大党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根本保证,也是为生民立命的根本保证。

(二)十九大党章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0]72},既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亦是为天地立心的生动体现

何谓天地?《诗经》《尚书》《左传》关于“天人感应”的记载很多。西汉大儒董仲舒进一步阐述了“天人感应”思想:“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强调了人之于天的作用^{[5]121}。“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的关学宗师张载,将先秦“天人合一”观念从王权垄断转向个人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何谓立心?心,乃性之所存也。张载继承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天地之性”,即“天性”原本善纯,但由于生物性需求所衍生的各种欲望,形成了“气质之性”的恶,潜藏于原本善纯的人性之中^{[5]328}。所以,立心乃是要通过实现人自身尊严、自身价值和自身发展,完成生命善美、道德境界的挖掘与确立。十六大党章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及至十九大党章“五位一体”布局中关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要求,都是实现人的尊严和全面自由发展的明确思路和具体措施。天地之心,人之善美,都将在党领导人民建设政治文明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天人合一”过程中重合、并立。这与《反杜林论》中人民成为意志主体的主张,即“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2]306},是趋于一致的。

(三)十九大党章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0]73},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忠诚践行,亦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担当

《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有力批驳了杜林对于美学、语文学、诗歌以及语言知识的错误思想,同时也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文化观^{[2]345-346}。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承的国度。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源于整个民族在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孜孜以求的思想追索与绵绵不绝的精神生长。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现,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1]。把历代先贤璀璨的思想学说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将不仅对中国社会前进与发展产生强有力的启蒙推动作用,更是对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担当。

(四)十九大党章提出的“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73-75},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深切验证,亦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本认知

《反杜林论》引论部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并且,还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不尊重自然、不注重联系、不敬畏规律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这种做法(指仅以解剖形态研究有机体),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思考,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思考,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2]20}先秦儒典《礼记》所描绘的“太平世”,是对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向往。但无论是老子“小国寡

民”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的“至德之世”,还是孔、孟的“德政仁治”“小康大同”,都只停留在形而上的论道中。唯有真真切切写入执政党章程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总要求,方能集历代社会理想之大成,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思想和执政理念,上升为全民族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令太平之梦自此不再缥缈。十九大党章还增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意识倡导和“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具体要求,旨在以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为全体人民守护美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着眼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遵循共商共建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由本民族扩展到整个国际视野,更是开万世之太平的先决条件。

三、渗透于党自身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要旨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一)“党要管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与中华传统文化逻辑

十九大党章不仅将“党要管党”上升到党自身建设的总体要求,更多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强调力度。按照西方“人性本恶”“以法制恶”逻辑,一个人或一个政党都不可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然而人性果真“本恶”吗?古老东方的思想家做出了完全不同甚至更为精当入微的结论:人性本善、人性三分、天地之性本善而气质之性有恶……这也正解释了西方社会为什么不能在“法”的精神之下调动出人性最光彩的尚善尚美尚容潜质和道德修养潜能。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中从来不乏自我修养、自我检省的思想和实践胜利:孔子把“仁”定义为“克己复礼”^[12],是为政者自我修养、自我约束的最精练命题。明初思想家从注重道德践履出发,强调治心悟道。其中,陈献章的核心思想就是论道、论我、论修养,主张“自得”。陆九渊认为发明本心的必要性,在于过分的欲望“戕贼”“放失”了本心,因此需要认清蒙蔽与戕害“心”的障碍,对心进行清洗和保养,将解除心蔽的方法叫做“剥

落”^{[13]299}。王阳明建立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的知行合一学说,将人的自我修养统一到“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之上^{[4]118}。由此,或可得出结论:那些超出、或大大超出社会平均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的社会成员,其不断成长的动力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我修养的需求与体悟。同样,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能否真正吸引和汇集一国贤明之士,重要的标准和尺度就是其自我管理水平和自我修养能力。

然而,面对贪欲等人性诸恶的赫然存在,自我管理与自我修养的难度之大,所需定力及条件之苛,是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对于执政党,党要管党的最大障碍在于特权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特权”作出了直白剖析:“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有特权和受歧视的阶级”^{[2]157}。恩格斯不仅反对特权,更强调平等:“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112}。韩非子在《五蠹》里分析:为什么古人可以禅让天下,而今人连一个县令的职位都不肯让与人?是因为尧、舜、禹做天子的时候,其衣食住行与一个普通守门人无异,其劳苦程度与一个仆人无异,他们让出天下其实是丢掉了一件负担。而当今一个县令却有许多特权,他死后,他的子孙出门还有车马,因此自然不愿让出官位了^{[13]104}。韩非子此言正说出了特权衍生贪妄之弊。孔子主张“齐之以礼”,即制定和遵守规矩必须一把尺子量到底。他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4]难道维护秩序的各种制度和规则,都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虚张声势的吗?孔子此问也问出了制度法律面前自立特权之乱。党章明确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措辞至严至厉,何也?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直陈要害:“私利”流行,还是“公义”流行,是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志^{[5]156}!

(二)党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性解读与中华传统文化依据

《反杜林论》哲学编在讲到道德和法时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

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99}。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之一,党章在总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求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一切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这些要求既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也彰显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中国古代主要由圣贤、学者、豪杰等社会角色构成的士大夫阶层,以其杰出的德才与修养、坚守理想信念的笃定以及关怀现实困厄的胸襟,而成为全民族优秀文化、先进思想、完备人格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代表,他们的精神也必将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发挥蒙正与化成作用。

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十八大党章新增补的内容,其中深意可从孟子“浩然之气”的养成上理解。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一种最伟大、最刚强的精神状态,但必须与义和道相匹配才能存在:人一旦做出于心有愧之事,浩然之气就会消散^{[7]67}。所以,养“浩然之气”,就是保持道德和品行的纯洁。党员的先进性特质,要求每一个党员须从严格律己、张义弘道、品行无暇,常保浩然之气。然而,能否做到心中从来无愧?做到了,便是纯洁性的实现。若做不到,将其彻底清除出党员队伍,不再给其危害党的事业、伤害人民群众、损坏党群关系、败坏党风党纪、破坏党的形象之机会,就是党的纯洁性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三)选人用人标准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价值与中华传统文化尺度

党的干部队伍是党的战略和政策得以扎实贯彻落实的关键力量和重要执行者。毛泽东曾经论述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使用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5]。党章除了在第一章对党员的申请条件、觉悟要求、义务权利以及加入退出作出了具体规定,还特别在第六章“党的干部”中,对干部选拔做出明确规定,强调了理想信念、道德修养和任人唯贤三个方面的标准和要求。

十九大党章第六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信念坚定”“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编中写道,“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2]307}。实现共产主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共产党员如果具备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就意味着履行党员义务,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都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行动自觉。因为,坚定的理想信仰将产生支配行为的强大力量,将视为追求信仰而做出的一切付出为最大幸福,是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的动力。《反杜林论》中是这样阐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的:“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317}。这说明,终极之乐,是对体能和智能发展的追求。宋明理学先驱周敦颐向程颢、程颐授业时,根据《论语》中孔子蔬食饮水而乐在其中、颜回箪瓢陋巷而不改其乐的记载,要求二程回答“孔颜乐处”“所乐何事”^{[5]383}。圣贤所乐,自是为己修身明心、为天下立德,这与党员所乐在于为人民服务,有同曲之妙。

党章规定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并要求“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实际上就是将道德标准作为党衡量干部的最高标准。道德,自古就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系列操行的最高维度。理学伊洛学派创始人程颢、程颐两兄弟更是将作为道德总称的“天理”上升到宇宙本原和万物变化规律的高度,使道德成为人类自我成就的终极依托^{[3]21}。党章不仅对党员干部个人提出道德修养的要求,更在治国理政层面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可见,干部之修身与天下之太平,皆须从道德修养层面下功夫、做文章。

党章规定选拔干部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墨子“尚同”思想主张“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即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是国家管理之根本。同理,执政党的各级干部

能不能做到思想统一、意志坚定、是非分明、政令畅通,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然而,墨子在提出“尚同”之前,还提出了一个“尚贤”作为前提,因为他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王公大人“便嬖、宗族、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而人民则不肯与这些结党营私之徒保持“是非一致”,从而“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社会因此而混乱不堪。据此,墨子认为,非“尚贤”而不能统一是非^{[5]31-32}。党章要求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是切中了党自身建设之要害。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3.
- [2]恩格斯. 反杜林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胡适. 中国哲学史 [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 [4]《中国哲学史》编写组. 中国哲学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5]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 [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 [6]钱宗武.《书》学大道 必兴中华 [N]. 光明日报,2016-05-23.
- [7]宁镇疆. 国学经典·孟子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 [8]杨天宇. 礼记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65-266.
- [9]史记 [M]. 文天,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410-411.
-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2016-05-29.
- [12]钱逊.《论语》读本·如沐春风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14.
- [13]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中国哲学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4]孔丘. 论语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350.
- [15]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527.

(责任编辑:田军)

Party Constitut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ccordanc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lassical Works of Marxism

LU Wei-ming, ZHANG Min-na

(College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China)

Abstract: Party Constitut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basic program of Marx political party is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Marxism Chinese. Its basic essentials reflect the accordanc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classics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combined with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un through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Secondly, the Marxism class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together support the Party Constitution on the overall layout, that i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 the people to develop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emocratic politics, advanced cultur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rdly, the tenet of Marxism classics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ermeated the thought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bout the party’s self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party should supervise its own conduct,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advancement and purity, the standard of selecting and employing people etc.

Key word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Anti-Dühring*